



新世纪万有文库

共同事业的哲学(二)

范一译
费奥多罗夫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共同事业的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使命

王德安 著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共同事业的哲学

(二)

费奥多罗夫 著

范一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东转移,转到了北京(中国向东部的转移,向海洋靠近,减少了从海洋和从北面经西伯利亚进入该国的困难。离开西部转移到东部边缘,从陆路抵达这个远东地区难度很大,这些情况不能不使人产生从海上甚至从西方到达中国的想法)。蒙古人虽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视同仁,但在向西方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转向了伊斯兰教,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看做伊斯兰教的盟友。当西方的基督教徒必须撤退,放弃中心阵地前面所有攻占的地方时,穆斯林却一如既往,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中心阵地拜占庭。然而穆斯林是在作了巨大的旷日弥久的努力之后才如愿以偿,突破中心,攻占拜占庭并征服印度的。这些努力削弱了他们的两翼,因为这一段时间前后穆斯林一方面被西方基督徒赶到直布罗陀以外,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摆脱了他们的桎梏。君士坦丁堡之所以会被攻占,只是因为伊斯兰教占领了整个欧洲东部,而西方又因分裂而变得软弱无力,以致土耳其甚至把以新教徒和法国人为代表的西方看做盟友。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对后来的整个战争进程产生了严重后果:它对东西和南北的直接交通造成了困难。因此从这时起西方基督徒开始向南、向西(甚至向北)运动。这些运动从两个途径——绕过非洲和穿过美洲——把他们带到了同为伊斯兰教的印度,只不过是另一面,从背面带到罢了。

如此一来,所有这些运动都可以看做重复当初开辟的道路,从背面绕过穆斯林前沿阵地的迂回运动,而且把美洲看做通往伊斯兰教的东方的中途站,看做实现基督教统一的后备力量,看做与旧欧洲齐心协力奔向一个共同目标的新欧洲,这个目标就是同伊斯兰教进行长期斗争。

哥伦布本人曾以必须发现所有的陆地以便传播福音书和将圣城归还教会来解释他从西方开始的印度之行。为了同一目的罗马教皇号召人们援助征讨非洲摩尔人的葡萄牙人,这次征讨后来也把葡萄牙人带到了印度。当埃及苏丹以破坏圣地相威

胁,试图迫使葡萄牙人离开其占领地时,葡萄牙人也以牙还牙,对麦加和麦地那造成威胁。

伊斯兰教一面临西大洋,一面傍东大洋,环绕它走一圈等于作一次环球航行。因此,伊斯兰教对中心即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导致了整个地球的发现。这一发现照理说必定会中止在地球上寻找地狱和天堂,寻找祖先住所的尝试和从涤罪所解救灵魂这种意义上的十字军远征。可是你能拿这种古已有之的(至今仍在民间存在并被上层歪曲的)原始追求怎么样呢?它把所有到遥远的国度旅行都看成去死者之邦,无论是十字军远征,还是什么行动,它都把它当做父亲的事业。只要还有死亡和损失,这种追求就不会消逝,你能奈何它吗?!

当地球全部被发现后,死人之邦(他们在那里处在一种半死不活的或某种别的什么状态)便再也无处可觅了。我们只好在他们移交给我们的生活中和他们留下来并且回归土地(为了我们大家对它的共同行动我们现在已经从四方八面发现了它)的遗骸中去寻找他们了。换句话说,对死人之邦的寻觅应当变成使他们复活的集结,十字军远征应当具有解放中心的直接作用。这个中心应当制订出上面讲到的对地球采取的行动的计画,应当集中这些行动的方向。因此,地球的发现向人类指出了一种活动,这一活动的不足正在把基督教变成一种理论,并且把它对异教的胜利限制在思想、拟人的领域,从而使基督教在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

这种思辨倾向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受到致命的一击,但无论是历经千年的神学辩论,还是历经千年的对世界末日的期待,都没有因此而结束。

上述迂回运动的结果——发现地球——是在执行古代世界的遗嘱,这个古代世界通过它的最后一个代表君士坦丁堡保存下来。止于大西洋的古代世界坚信环球迂回是可能的,如果说

它没有亲自完成这一迂回,那只是因为蛮族开始入侵的缘故。古代世界的遗嘱因为不具备法律的即外来的强制性质而更有履行的必要。惟有对父兄的忠诚才会要求执行这一遗嘱。对我们这个用各种小事即私人的和社会的琐事来限制自己的时代来说,用遗嘱来主宰我们的命运,来决定各民族的活动(即所谓政治),似乎显得很奇怪,很幼稚。参与共同的事业,认定统一并不具有抽象的意义,认定基督教或统一并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世界主义即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公民而实际上却不是的一种廉价、轻而易举的方法,似乎显得很幼稚;把基督教看做共同的事业,似乎显得很幼稚——按照遗嘱,这一事业应当成为反对蛮族、游牧民族的行动,因为它们通过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止古代世界去发现新的世界并结束了古代世界。但是这种行动不会构成对我们与游牧或穆斯林民族的共同祖先的侮辱,因为它只是解除这些民族的武装和解放君士坦丁堡的协同行动。无论美洲,还是大洋洲都不能也不应该拒绝执行古代世界留下的遗嘱,因为其中包含着共同的即祖先的事业,再遥远的距离也不能使人置身度外,不参与此事即不履行义务。“新”大陆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抛弃旧大陆。“新的”的意思就是儿子的,即表示对旧的、父亲的大陆的义务。而且这一义务不限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既然新大陆居民的直接祖先(对美洲来说就是新教徒)认为基督教就是自由,就是摒弃过去,是对维系他们与旧大陆的联系破坏,那么他们的后代就负有恢复这一联系而不是维护显然有悖于基督教的理论的责任,因为基督教是集结,而不是分离,也不是天主教梦寐以求的征服。

天主教的活动或弥撒就是 16 世纪前西方的全部历史。弥撒这个词被理解为教堂内完成的活动(祈祷、忏悔及弥撒本身)和教堂外完成的活动(具有赎罪力的活动;业绩,如十字军远征,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反对非宗教政权以提高宗教政权声望的斗

争;建教堂、修道院,乃至所有中世纪的艺术)。到了16世纪,所有这些活动都尽可能地被钱币供品所代替,据说这些钱币供品具有赎罪供物的效力,而赎罪供物能给人赎罪券和宽恕。这种弥撒理论就是天主教的整个神学体系,它不仅包括西方的内部历史,也包括其对外历史,它认为上面列举的活动具有业绩的拯救力。所有其他信条都是从这一信条引申出来的。作为公正裁判者的上帝的概念也是缘此而来的。关于这位公正的裁判者路德曾说过:“我无法忍受‘上帝的公正裁判’这话;我不喜欢这位公正和神圣的惩罚罪人的上帝。我内心对他感到愤怒,憎恨他,因为他不满足于用生活的法规和灾难来吓唬我们这些已经被原罪断送的、他的可怜的创造物,他还用福音书来增加我们的痛苦”。^②关于耶稣基督面貌的理论也来源于同一信条。要弄明白这种建立在业绩要求基础上的理论是如何介绍基督的,只需援引路德说过的一句话就行了。路德说,他小时候一听到基督的名字就吓得面色发白。关于地狱、涤罪所、天堂的理论,这一切都与业绩论紧紧联系在一起。可是不管天主教的影响有多大,在西方本土总是有人不服从它或反对它。甚至可以说,在每一个西方人的身上多少都保留着对这一活动的不满和反对情绪。这种弥撒可以叫做使人得救的业绩弥撒。但它本身并不是拯救行动,不是恢复、复活的弥撒。新教不顾土耳其的威胁(这一威胁之所以未能使整个西方团结起来对付自己,是因为人们找到了比与土耳其作斗争更容易得救的办法),从几乎缩减为赎罪券的外部弥撒开始,后来才着手改革或者毋宁说才否定弥撒。“但如果说弥撒贬低了上帝,”这位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说,“那么它就抬高了神甫,使他具有无穷的威力,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自己的双手再现创世主。那时教会的存在似乎不是为了宣传福音书,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它再现基督的形体。最早的罗马神甫——他的那些最不起眼的服务人员任意地创造上帝的身

体——将精神财富攘为己有,并同样随心所欲地从中搞出了赦免灵魂的赎罪券”。与这种对弥撒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彻底改变了的神学理论,它认为现在只有一种宗教信仰才能拯救,因此它把所有没有宗教信仰或不承认它是惟一可以拯救人的人即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在内的整个异教世界,甚至不赞同新教的整个基督教世界,都置于拯救之外。新教及其单一信仰论最终不能不导致自我崇拜。黑格尔说:“这个字(credo)*里道出了关于主观意识的自由和关于内心自觉生活的快乐的广泛思想。这个‘credo’使任何表面的权威都威信扫地。人用以证明自己正确的是信仰而不是行动,也就是说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方式,也不借助任何外在的东西。”基督是我的真正的救世主,既然他的业绩变成了我的感觉或者毋宁说我的思想的对象。“想想拯救行动吧,它将成为你的财富!”新教徒只专注于他那个人的、内心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把自己禁锢在它里面,用它来构筑整个世界,把看得见的自然,把上帝本身,都转移到自身里面。

新教的主观主义变成了个人思维的专制主义,而基督教思想则变成了泛神论或人神论(理性和个人观点的权利;个人在宗教领域的权利不可侵犯)。

然而宗教信仰本身是不可能拯救人的:惟有吸引整个心灵的行动才能引起精神的转化,把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为有献身精神的人。在新教里,鼓舞人、吸引人、使人振奋的也不是信仰。路德本人也认为,最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一个虔诚者将靠信仰活着”这种思想,而在于他是否把宣传这一思想变成自己毕生的“事业”。甚至他自己说过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你们不全心全意去反对渎神的教皇政府,你们便不能得救”。由此可见,新教也曾有过行动,只不过这种行动的内容是否定、斗争、分离

* 信条。——译者注

和个人的内心分裂。天主教的行动是对普遍的东西或弥撒的歪曲。但是既要否定又不赞成歪曲,便不能否定行动本身。宣传上述思想(虔诚者将靠信仰活着)只是看起来像行动,因为这种宣传的内容只不过是否定所有天主教的表面东西,否定仪式、圣礼、斋戒、僧侣的禁欲主义,只不过是使人摆脱共同的事业,使他失去共同的目标。废除节日和僧侣,即取消最能通过信仰,通过单纯的想像为拯救服务的东西,便可以成为说明所指的不是靠信仰得救的证据。路德说:“人啊,想像一下基督并体察一下吧,看看上帝是如何通过基督向你显示他的仁慈而不需要你的任何业绩的”。如果人的得救取决于这样的想像、体察,那么人就必须专心致力于体察或者尽可能经常地致力于它。其实,哪怕这样的限制也是不能允许的,它只不过证明了靠信仰得救理论中所包含的矛盾而已。

只有当任何行动都将变成拯救的手段时,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拯救。浅尝辄止地致力于拯救意味着使它变得毫无意义。而路德却力图耗费人的时间,废除节日即惟一可以让人去体察拯救的机会,并且废除了僧侣,亦即废除这样一种状态,人只有处在这种状态才能够把导致得救的体察当做他惟一的目标。

来自陷落后的君士坦丁堡的重新认识动摇了作为一种理论的三位一体说,也动摇了复活说——不过是超验的复活学说,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有别的复活说。关于超验的复活,据认为,它不会发生在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的时候,相反,它会发生在最大限度反抗上帝的意志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复活应当作为惩罚出现,所以它让人感到恐惧。而内在的复活则把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在这种复活里不可能出现超验复活里那种奇僻之论:复活即摆脱所有恶、弥补所有损失,它是一种惩罚。

西欧的思想源自君士坦丁堡。它先是以阐明教义的理论,后来又以批判的理论的形式发源于君士坦丁堡。一旦它在自然发展的进程中认识到自己乃是集阐明教义之思想和批判思想于一身的行动计划时,在中心或集中地将会感觉到一种共同活动的需要,那时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帝都留在土耳其人手里了。不过应当承认,科学不仅仅是思想,这样,君士坦丁堡的历史就是全世界的历史这一意识才会变成自觉的行动,所有善于思考的人,甚至土耳其本土上的人才会赞成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手里解放出来,赞成防止任何来自东方、西方、北方等企图侵占它的觊觎非望。只要我们仍然把关于形而上学辩论、关于死板仪式的概念同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也未必会得到解放。假如希腊被解放了,它是否应把这归功于古埃拉多斯的命运在西方欧洲人中引起的同情呢?西欧自己也具有埃拉多斯的形象或与之相似。但是使西方基督教徒发现地球的那些迂回运动也把他们带到了富裕的印度各国。这些国家对西方极具诱惑力,博得了它的好感。于是十字军远征变成了贸易远征,骑士变成了重商主义者(所谓西方是指上层,指城市;农民阶层完全是受压制的,在这件事上毫无发言权)。体现了整个中世纪世界观的十字军远征在18世纪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欧洲以这一转变告别了它的少年时代,变得更有了作为了。

从迂回运动把西方的基督徒带到印度的那一刻起,摆在首位的不再是共同的事业,而是效益和好处,是个人和民族的利益,是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所有这一切目的就是摆脱义务,背叛基督教的联盟和统一。传统、传说被废止,被指为偏见,因为它们使人想起了背叛,人们想通过背叛来洗刷自己的罪名。然而所谓消除偏见云云,其实是要摆脱良心和义务。显然,把自由思想即摆脱共同的父亲事业和摆脱良心奉为原则的宗教改革

运动(新教)和革命是最大的犯罪。(虽然引发革命的封建主义和新教所反对的罗马教皇统治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恶到另一个更大的恶,这已经带有盲目发展的性质了。)新教,即仅仅用信仰来洗刷自己(以信仰洗刷自己、赎罪是一种抽象的复活形式)只能涉及单个的个体。这种洗刷只有对自己来说才存在,只能靠内心的情绪来达到,它不能延伸到父亲及过去的一代一代人身上,因此它能使赎罪券变得毫无用处,不管它们是怎样得来的,是花钱买的还是通过十字军远征得来的。这样一来,新教便使这些远征本身变得不可能了。

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或人的思想和艺术感觉从为宗教(诚然,是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背叛了统一的宗教和以新教为代表的没有回到统一上来的宗教)服务中解脱出来,使思想陷入了新的,比以前更悲惨得多的奴隶地位,陷入了受商业—工业精神支配的奴隶地位,使它沦为奢侈的感官享受的附庸,成为形形色色背叛的辩护人。总之,这种形式的科学、艺术复兴是对人类的理性和感觉的亵渎。

对上面讲到的迂回运动的控制权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手里转到了法国人和荷兰人手里,最后又转到了英国人手里。软弱的葡萄牙人当然不会想到以征服君士坦丁堡来充分保障身后通往印度的道路,他们幻想把尼罗河的河水引入红海来达到这种保障的目的(阿尔布克尔克)^⑤。虽然葡萄牙人占领了阿拉伯海湾和波斯湾的出海口,与君士坦丁堡国王的敌人波斯王结盟,他们却没有躲过土耳其舰队的入侵,后者甚至包围了第乌。由于无力通过征服君士坦丁堡来保证对其印度领地的占有,葡萄牙人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他们的大部分领地甚至葡萄牙本土都被并入西班牙。西班牙环绕美洲为自己铺平了通往印度的道路,而葡萄牙只控制着环非洲的线路。环美洲的麦哲伦线虽比瓦斯卡·达·加莫夫线长得多,但从土耳其占领埃及时起,后面

这条线路上便出现了穆斯林舰队；而前一条路线则畅通无阻。可是，甚至马鲁古群岛，用参加过麦哲伦远征的皮加费塔的话说，在这次远征前50年（1520）就已被穆斯林或他所称呼的摩尔人占领，他们把自己的宗教也带到了那里。麦哲伦从另一面靠近马鲁古群岛，他根据罗马教皇的训谕证明，它们应当属于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西班牙人在勒班陀取得胜利后想进军君士坦丁堡，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巩固他们的作用，但此举未克实现（按照阿尔瓦公爵就勒班陀胜利所发表的看法，任何针对君士坦丁堡的举动如果没有得到基督教大国同盟的支持都将以失败告终）。西班牙将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了荷兰人和法国人。法国人虽然为了占据通往印度的线路直接与荷兰和英国开战，但他们明白，只有在东面他们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例如，根据莱布尼兹的行动计划，只有在埃及才能战胜荷兰。法国就不止一次想实行这一计划（舒瓦瑟尔）^④；但一直到波拿巴才决定着手具体实施。当欧洲第一位统帅出发前往埃及时，欧洲的第一位外交家也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因为，既然征服不了君士坦丁堡，只有同拜占庭或伊斯坦布尔结盟来保障自己，才能派出十字军远征巴勒斯坦，才能为了贸易需要远征埃及。虽然西方民族一味追求商业上的一己私利，忘记了十字军远征的初衷，但他们迫于政治的——如果说已经不是宗教的——需要而常常把目光盯着君士坦丁堡。在完成迂回运动时，当然不能不关心保持同自己的基地，自己的祖国的联络，也就是说不能不关心陆路交通，而它只能经过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谁都心存觊觎之志，五方杂处的中心。伊斯兰教甫一诞生，便向这里进发，占领君士坦丁堡后，便迫不及待地把它叫做“完全的伊斯兰”（伊斯坦布尔）。罗马教廷也希望通过征服君士坦丁堡使自己盖世称雄。当罗马教廷派出十字军骑士占领君士坦丁堡时，它的权势确实达到登峰造极，然而它却没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在西方恢复或者毋宁

说篡夺皇帝头衔这件事中也暗藏着对帝都的野心。对于帝都俄罗斯乃至斯拉夫世界有大得多的合法权利,不过不是占有它而是解放它的合法权利。共同占有君士坦丁堡必定会成为英国强大的商业—工业力量的顶峰。但是英国也不可能在那里站住脚跟……无论是东方(例如,伊斯兰教)——因为这将遭到西方的反对——还是西方均无法牢固地、理所当然地占有帝都。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只能属于所有民族,全世界的世界,属于拜占庭通过教义才知道的真理。

英国牢牢掌握了海上交通线,几乎占领了所有的法国殖民地,使法国再也不能将剩余人员输送到它的殖民地,输送到可以说是新法兰西去,从而成了所有革命骚乱的罪魁祸首。这些骚乱正是由于人口过分集中而又无法将其中最不安分守己的人分离出来,借殖民化之机把他们分流出去的结果。拿破仑把革命暴乱镇压下去后,全力以赴对付英国,把清除它的海上势力作为自己的目标。当然,此举本可以使法国有机会实行殖民化,摆脱新的革命。波拿巴也和塔列朗一样,认为要想避免内乱,必须让人口中最不安定的分子矛头向外,有用武之地。执政内阁也持这种看法,甚至把波拿巴本人当做最不安分守己的人派遣到埃及去。然而以对外战争代替内战,问题是否就解决了呢?进军埃及不可能成功,因为英国还掌握着海路。而法国又未控制通往埃及进而到印度的陆路,如上所说,这条路非经过君士坦丁堡不可,因为它既是最短的路线,又控制着通过叙利亚和埃及,通过阿拉伯湾和波斯湾的几条道路。(波拿巴想占领埃及,从那里可以作为土耳其的盟友支援英国人在印度的敌人。他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崇拜者,却不得不去攻打土耳其人并向君士坦丁堡推进。由于命运的作弄贸易进军变成了十字军远征。还算波拿巴幸运,这一次胜利与他失之交臂,才使他没有成为耶路撒冷的无意的解放者。)可是要想占领君士坦丁堡,不但需要征服整个欧

洲,而且要征服俄罗斯。俄罗斯也和埃及一样,可以成为通往印度的中途站。这样一来,拿破仑的所有战争都可以看做把他引向君士坦丁堡的前卫战,入侵俄罗斯则是大决战,它必定会为他开辟道路,即使不是直接打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而占有君士坦丁堡势必使他最终取得对英国的优势,并有可能攫取印度。

在进行迂回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即西方的哲学。衰亡论为进步论所取代,虽然这种进步也是衰亡。来自对古代世界的认识的异教观点获得了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甚或西方的基督教作斗争的新力量、新手段。而东方的基督教,拜占庭的基督教则被认为比任何评论更落后。自然宗教、自然法是第一印象的产物,是对在新开辟的道路上遇到的生活现象的最初的表面的认识的结果,对野蛮人这些仿佛是大自然的天真无邪的孩子认识的结果。中国的自然神论、冷淡主义、忍让,印度的三位一体、神的化身,佛教的道德,这一切都成了与宗教和旧秩序进行斗争的工具。始于1789年的那个时期便是这种表面认识的结果,但是这一年却没有成为变革的肇始,成为革命,而仅仅是变革的结束。这一变革以善于思考的阶级脱离民众,以他们从行动的阶级中分离出来为开端。上述时期将偏见和迷信及建筑在它们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视为恶,因此它的任务便是谴责迷信。可是与此同时合理的认识也受到了谴责。轻信和轻率是整个变革的基础;这种轻率也是恐怖分子的“理性女神”。(在不算太肤浅的研究中“澳洲的田园诗”不见了,佛教似乎在教人以悲观主义,而中国表明,未来等候那些把工业当做惟一目标的人的是什么。)

中世纪的欧洲(西欧)应看做持续不断进行十字军远征的欧洲,看做,用莫里的话说(《圣路易颂》^⑤),“赎罪的圣礼,军事的忏悔”,看做造就骑士、贵族的欧洲,这些贵族把自己的贵族门第建筑在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用纹章永远保存下来的业绩上。而

近代的欧洲在进行迂回运动时,却因为忘记了初衷而造就了资本家和无产者,它一路上对野蛮人实行斩尽杀绝,大肆掠夺印度和中国,同时又从这一迂回中获得了纯洁和无辜意识,得出了对堕落的否定,并因这一意识而带动了变革。这不是忏悔的远征,而是证明自己正确的远征。

伊斯兰教的削弱以及因在游牧民族入侵的必经之路上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国而停止的入侵,促进了迂回运动向重商主义运动的转变,促进了背叛的完成。游牧人的入侵不再使人想到共同的义务即基督教(而一个不需要行动或很少需要行动的宗教,可以看做死去的或正在死亡的宗教)。伊斯兰教的衰微似乎使针对它的直接和迂回运动变得多余了。这种背叛的后果是:1)财产不均,这是重商主义的直接后果,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封建主义的宗法性质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以及2)人的本性是纯洁的思想(即否定堕落,否定赎罪的必要,或否定整个基督教),这一思想在迂回运动中从对野蛮人的表面认识中得到了证明。

当英国人使法国失去掌握迂回运动的权利(霸权)即失去大部分殖民地时,渐变带有了爆发性,背叛变成了背信弃义(尽管它所针对的那些人也不再忠于对父亲的共同义务)。爆发(革命)是由那些不承认活人(现在的人)与死人(过去的人)之间的一致的人引起的,也就是说,不是由儿子们,而是由那些自命纯洁和无辜的公民、商人引起的,他们一味指责当局,说它强制性地把他们置于有悖于他们的纯洁本性的关系里。

百科全书派及其先驱者的全部所作所为可以称为由葬后餐向宴会,向沙龙式谈话的转变。这是以惊人的轻率完成的背信弃义。它既不需要长期的研究,也不需要深入的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作一点走马看花、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便可以提出自己对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对轻率负有责任的是哲学家,而背信弃义则是由历史完成的,它把宗法制的耕作生活

方式变成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一否定的世界观全部都是在沙龙的谈话中,在开着玩笑,讲着俏皮话时形成的。这是没有痛苦的否定,因为儿子的爱,儿子对父亲的爱,早已在心中荡然无存。

葬后餐是基于对父亲的怀念,基于对死后仍有存在这一信念的,而宴会则基于对父亲的遗忘,对不死的否定。葬后餐是为生者和死者作出的牺牲,是为生者和死者进餐,或者是简单的形式,就像现在这样。宴会则是欢乐的盛宴,在这里对不死的否定成了怂恿人们及时行乐的动机。这些宴会,这些“dégeuners”和“soupers”^⑤,单凭人们忘记了死人,因而也忘记了自己的不是,忘记了遗传下来的恶习,就已经其乐无比了。对葬后餐来说,面包和酒具有神圣的意义;它们是存在、生存的条件。而对宴会而言,它们只不过是供享受的食品罢了。宴会哲学家自以为有权穷极奢侈,因为他们似乎坚信,基督教是贫困的罪魁,宣传现在的禁欲主义和来世的极乐的是基督教,而不是他们这些生活奢靡的人自己。他们把这种奢侈当做一种公平的奖励,是因为这种奢侈的未来成了沙龙谈话的题目而对所有活人进行的奖励。然而这些沙龙宴会,这种否定的流派具有抗议教堂和弥撒的意义,因为教堂取代了教会,弥撒变成了祈祷,这种祈祷似乎通过它的弥撒使基督复活。设使基督教深入生活,成为人类所有子女的惟一的、共同的事业,生活是不会被如此歪曲的。上述流派对遭到否定的前一种流派的不可理解到了何等地步,后来发现的埃及文献的诠释作了再好不过的说明。埃及坟墓上画的日常生活场面,不是被看成生平经历图,就是被看成死者在阴间享受的极乐图。人们根据自己来判断(这也是现代不可分割的典型特点),认为埃及人也关心记忆中的存在,关心名义上的存在,也是爱慕虚荣的,也只是希望好像是,而不是是。然而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诠释并没有得到证实:埃及人把所有这些图画都视为有效的手段,认为它们是维持死者在阴间的生活的有效力量。

这种对祖先的关心是所有原始民族的属性并且至今仍多多少少在所有从事耕作的民族中保留下来：在民间的解释里圣餐仪式本身就是葬后餐，它能有效地安慰死者或者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能供给它们东西吃。

由于葬后餐变成了宴会，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流派应运而生。另一个流派没有那么彻底，这就是自然神论。它属于由葬后餐变为宴会的流派。路德的努力便是这样。他试图哪怕部分保留葬后餐中能真正纳入他的神学理论的东西。在这一理论里同一路德认为只要回忆一下救世主的功绩，只要想像一下他的功绩便足以得到拯救。这两个流派也主宰着大革命：埃贝尔派属于前者，而罗伯斯比尔派则是相反的因素。

如果简单地用一个公式表示，革命可以叫做以社会的事业取代共同的父亲的、祖先的事业，叫做背叛或摒弃父子的义务，为了活人的利益而摒弃死人的复活。共同的事业源于所有人的共同灾难（死亡及所有导致死亡的东西）。而社会的事业涉及的不是所有人，而仅仅是某些人，社会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人，它源于贫困之类的现象。但如果比较深入地，而不是像产生法国大革命的流派那样肤浅、轻率地看问题，人们就会相信，有死亡就有贫困，正如基督早就说过的：“乞丐永远和你同在。”共同的事业是真正的共同事业，哪怕死亡也不能对它加以限制，也不能缩小它的共同性。共同的事业不仅限于活人，它是活人为了复活死人的一种联合，也就是说，它是对普遍结合（不仅外部的，也是内在的）的一种要求，要求真正的友爱的（兄弟的，父子的而不是公民的）复活。共同的事业甚至不会跟死亡妥协，因此其中不存在随意性。而社会的事业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交易。共同的事业古已有之，它随人的出现而出现。所有我们已经知道的叙述野蛮人、原始人的材料都显示了对死人的关怀，也就是说，死亡破坏不了活人同死人的联系。只要还会对着死者说一